

# 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

## —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

郑小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通过对主要分布在古代越族地区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器物—镇的研究, 揭示了其发展演变和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 并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 推测在战国中晚期, 越族中的一支曾经有一个从浙江东北部向岭南迁徙的过程。

**关键词:** 东南地区 春秋 战国 镇 古越族 迁徙

### 绪论

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的迁徙与文化交流, 一直是研究古越族文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相关文献的匮乏甚或相互矛盾, 也阻碍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而同时, 大量的考古发现则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即在对古越族分布地区出土的一种特色器物—镇—的研究的基础上, 对其迁徙活动作一种尝试性的探索。

### 一、镇的命名

在吴越和百越为主体的地区, 出土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 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西部和浙江东北部, 另外, 在江苏南部和湖北的个别墓葬中也有零星的出土。该类器物的基本特征为: 器体绝大多数呈近半球形, 略扁, 多有纹饰, 个别为素面, 顶部有钮和活动的环, 平底, 腹部中空或灌有铅块, 质地有铜质和原始瓷器、陶器、玉器等不同的材质。对于这类器物, 目前尚无统一的定名, 有人根据其外形直接名之为圆球形器<sup>[1]</sup>, 有的称其为坠<sup>[2]</sup>, 也有的呼其为铃或铃形器<sup>[3]</sup>, 有的叫作权或权形器<sup>[4]</sup>; 还有人称之为镇<sup>[5]</sup>, 定名的混乱反映了人们对其功能认识的模糊。孙华在《半球形器用途考略》<sup>[6]</sup>一文中排除了其他名称的可能性, 肯定了“镇”的命名, 并进一步论证其为压席之器, 与汉代的铜镇形不同而作用相同。周燕儿的《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sup>[7]</sup>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看到, 除了上述各种半球形器外, 1972年在广东肇庆松山北岭发现了4件所谓的“方形器”, 除了器体为方形外, 总体结构与半球形器一致, 上部都有钮和环, 器体布满纹饰, 底平, 器中灌铅柱, 大小也相去不远, 并且也是4件成组出土, 作者认为其为某种器物的一部分<sup>[8]</sup>。从该类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况来看, 应该是和所谓的半球形器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因此, 仅仅根据外部形状来命名是不合适的。而这种器物与铃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sup>[9]</sup>。铜坠的命名显然没有什么证据。从这类器物的形制上来说, 与秦权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从其出土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 除了个别遗址外, 绝大多数遗址中, 该类器物都是成偶数出现, 尤以4个同出最多。而且, 在出土情况比较明确的如曾侯乙墓<sup>[10]</sup>、松山北岭墓等, 4个此类器物摆放的位置近成梯形或长方形。而绍兴印山越王陵出土的19件玉质该类器物中, 除了一件发现于盗洞扰土中外, 其余18件均发现于中室, 有的见于南北两侧的挡坎上, 有的则发现于靠近挡坎内侧的底面上。在中室的东北角发现有两处竹席或竹编痕迹, 在此之上还压着两个此类器物。从其分布的情况来看, 排除盗墓者的扰乱因素,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基本

上呈长方形紧贴着墓壁分布于中室的东部<sup>[11]</sup>。这些现象都与周文所分析的压席之镇更为接近。而且，多数铜质器上华丽的花纹，尤其如曾侯乙墓所出上装饰的精美的浮雕龙纹，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意味，也显示了该类器物的不同寻常，与讲究实用精密的权相去甚远。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器物的功能基本上是清楚的，应该是作为镇来使用，或者即是压席之镇。当然，在有的墓中，虽然也未被扰乱，但从其组合和分布位置来看，似于与镇的功能相去甚远，如在四会高地园遗址仅出土一件，简报中说该墓葬未被扰乱；在淮阴高庄墓中，出土了 6 件，均放置于一个大铜釜中，对此，周文也未作具体的解释。我们在后面将对此作出相对比较合理的推测。

## 二、形制与年代

在出土的各类镇中，原始瓷和陶质的镇应当是仿照青铜镇而制作的，因此，我们主要根据青铜镇和玉镇来判断其年代和发展演变的过程：

1、1972 年肇庆北岭松山墓出土铜镇 4 件，整体呈方形，上部有纽和环，四周饰雷纹。器中灌有铅柱，下部也有铅皮，长宽高均为 6.3 厘米。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黄展岳<sup>[12]</sup>、李龙章<sup>[13]</sup>认为是南越国墓。该墓出土的铜 II 式鼎、附耳筒、陶甗、陶罐和陶盒等器物则与广州秦与西汉早期墓所出相近，而铜三足盘、提梁壶、壘等则具有明显的战国特点，同时，该墓不见有常见于两广汉墓的陶壶、钫、鼎、盒等器物，因此，将该墓定为战国秦汉过渡时期是比较合适的。

2、1974 年广东四会县龙江高地园 M1 出土铜镇 2 件，为大半个圆球体，顶部有环和纽，其中一件纽下和近底处饰一周雷纹，中段呈瓜棱状，高 6.8，腹径 8.6 厘米。另一件纽下也饰雷纹，中部和近底处为两周云雷纹。该墓的年代简报作者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sup>[14]</sup>，而李文认为当晚在秦汉之际。该墓出土的匏壶与德庆落燕山墓<sup>[15]</sup>所出形制一致，后者的年代当在战国中期<sup>[16]</sup>。而与广州早期汉墓的匏壶有着较大的区别<sup>[17]</sup>，其他诸类器物与广州汉墓的同类器物也明显不同，其年代应至少在战国晚期之前。而该墓出土的铜镇则与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镇非常接近。鉴于该墓出土的器物与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西汉早期的器物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该墓的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

3、1977 年在广宁县铜鼓岗 M14 出土铜镇 1 件，器体为大半个圆球，顶部半环纽，纽穿圆环，器内顶部灌铅块加固，底边内收。纽周饰涡纹，主体为三组凤纹，近底饰一周 S 形云纹，通高 5.2，底径 6 厘米<sup>[18]</sup>。该墓的年代，简报认为当在战国晚期，李文定在西汉早期。从出土的器物来看，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是比较合适的。

4、1978 年在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墓出土 6 件，铜铸外壳，内充铅锡，整体球形，平底，顶有环纽，纽四周及底缘饰云雷纹，球面饰直条瓦棱纹<sup>[19]</sup>。该墓的年代，原报告定在战国中期前后，朱凤翰以为是为战国早期<sup>[20]</sup>，王厚宇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sup>[21]</sup>。从该墓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将其定在战国早中期时是比较合适的。

5、1977 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4 件，大小、形制、纹饰均同。呈半球形，中空，平沿，定有衔环，龙形纽，面部雕着八条浮雕状的龙身饰鳞纹，龙与龙之间空隙处有十四个高出盖面的小圆圈，圆圈内原有镶嵌物，已脱落。高 8.0，直径 11.8 厘米，重 1.25 公斤。该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sup>[22]</sup>。

6、1995 年在绍兴福泉镇洪家墩村猪头山坡出土 3~4 件，仅一件可以复原，器身呈半圆形，较低矮，铜铸外壳，内灌铅、锡类渣质，顶面饰宽凹弦纹两周，中央为勾连粗云纹，腹部铸宽凹龙纹 8 条，分上下两组，以梭形纹界格，高 6，腹径 8.9，底径 8 厘米<sup>[23]</sup>。周文

认为其年代当在战国晚期，与广宁铜鼓岗相似。从该器的纹饰来看，这种顾首龙纹加梭形界格的纹饰，在楚国青铜器中常见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器物，如浙川下寺 M2：54 铜铍表面纹饰<sup>[24]</sup>。因此，此器的年代最晚当在战国早期。

7、绍兴印山大墓 M1 出土玉镇 19 件，其中有 18 件出土于墓室内，1 件发现于盗洞内。形制、纹饰和质地都相同，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表面通体抛光，整体呈馒头状，实心，顶面呈弧形隆起，上有一扁圆形小纽，纽上横穿细孔。器体有一周八条纵向的折棱，将其分为八等分的区域，底平。器身通体阴刻细勾连卷云纹。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在春秋晚期<sup>[25]</sup>。

在上述器物中，年代最早的当属绍兴印山大墓出土的玉镇，可以确定在战国早期的有随县曾侯乙墓和绍兴福泉镇洪家墩出土的铜镇，年代稍晚属战国早中期之时的有淮阴高庄出土的铜镇，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的四会高地园 M1，稍晚的有广宁铜鼓岗 M14 出土的铜镇，最晚的为肇庆松山北岭出土的方形铜镇。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铜质和玉质镇的主要形状为顶面弧度比较平缓，然后腹部中间有个突然内收的部分，形成一个肩部，整体近乎大半圆形，个别的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为半圆形，而在肇庆则出现了方形铜镇。这类器物由于出土较少，而且分布的地域比较广泛，其具体的形制演变过程目前来说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大致的一个发展过程。如在最早的时候器体饰勾连卷云纹，战国早期时出现了浮雕龙纹或者是梭形界格纹与宽浅顾首龙纹的组合，战国早中期的时候出现了瓜棱纹布满全身的装饰，也有以云雷纹为主体的纹饰，但在这之前其总体的形制并没有多大改变，器身相对都比较高。到了战国晚期，出现了细线凤纹为主体的装饰，并且器形明显较以前为扁。再稍晚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方形、满饰雷纹的铜镇。

明确了铜镇的发展趋势，我们就可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伴出的器物，进一步对原始瓷镇和陶质的年代和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原始瓷和陶质镇均发现在浙江地区，有明确器物组合者共四处：

1、1983 年海盐县长川坝乡丰山村一土坑内出土 2 件原始瓷镇<sup>[26]</sup>，其共出的器物多具有战国早期特征，如其中的原始瓷盅、印纹硬陶坛、罐等器物都与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sup>[27]</sup>、陈元甫《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试论》<sup>[28]</sup>文中所分的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同类器相似，罇于也被刘建国<sup>[29]</sup>定在战国早期。

2、余杭宗贤 M1 出土 6 件原始瓷镇<sup>[30]</sup>，该墓出土的器物中，束腰鼎、附耳鼎、甬钟等器物与海盐丰山村土坑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年代当一致。

3、1989 年绍兴县平水镇上灶村东首土墩墓出土 2 件原始瓷镇<sup>[31]</sup>，该墓出土的原始瓷盅似于海盐丰山村，兽面鼎则与余杭宗贤 M1 所出相似。但该墓出土的镇与淮阴高庄墓的铜镇最为接近，年代可能略晚。

4、慈溪 M6 出土了 4 件泥质陶镇，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sup>[32]</sup>。

从上述几处出土的镇来看，其形态多为器体较高的大半球形，顶部的弧面相对较为平整，到了中腹部基本上都有一个突然内收的部分，形成双肩的形状，年代上也基本上为战国早期或略晚。可见，原始瓷质和陶质的镇在形态上与铜镇基本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另外几批没有伴出器物的原始瓷镇的年代了。1990 年绍兴平水镇上灶村村后小山坡土坑墓内出土的 4 件原始瓷镇，其形状与该村的东首土墩墓所出最为相象，年代可能在战国早中期之时。1960 年绍兴城关镇西施山出土的原始瓷镇，形态上与余杭宗贤 M1 所出相近，器体较高，年代当在战国早期。绍兴市征集的 4 件原始瓷镇，其形态与海盐丰山村所出非常接近，年代大致相当，为战国早期。

### 三、族属及其起源和传播

目前出土的这些镇，主要分布在浙江东北部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和广东西部地区，尤其又以前者居多。在此范围之外，仅在随县曾侯乙墓和江苏南部的高庄墓有所发现。绍兴地区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时为越国的中心地区，一般认为其族属即为百越之首的于越<sup>[33]</sup>。广州西部地区，有人认为是古西瓯之地<sup>[34]</sup>。蒋廷瑜更进一步认为广宁铜鼓岗、肇庆松山等遗址即为西瓯族遗存<sup>[35]</sup>。也有人认为该地先秦西汉时期的古代民族当为“苍梧”，也为越人的一支<sup>[36]</sup>。甚至还有人认为骆越有两支，一支即为西瓯骆越（瓯骆），另一支为秦象郡之骆越，而上述之地属瓯骆<sup>[37]</sup>。总之，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法否认其作为百越一支的属性。淮阴高庄战国墓墓主原报告认为无法断定为楚人、越人还是徐人，王厚宇则认为当属越人<sup>[38]</sup>。从该墓出土的器物来看，铜鼎、鉴、盃、盘等器物与吴越地区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而且铜鼎、盘和盃器盖和器身上所饰的云雷纹也常见于吴越地区，如苏州虎丘<sup>[39]</sup>出土铜鼎的器盖和腹部纹饰与其完全相同。可见，该墓即使不是越人墓，也是深受越文化的影响。至于随县曾侯乙墓，从其随葬品来看，是为楚文化系统，但其文化也受到周边地区如吴越等地的影响。而且，在该地发现铜镇者仅此一例，可见，这些器物也当是受越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同时，该墓出土的铜镇，在形状上与他处有较大区别，因此，这种影响应该不是输入性的，而应是受越文化习俗影响后在当地铸造的产品。这样，我们首先就确定了镇是原产于越文化的，为其一种特征性器物。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与各种质地的镇相对比较密集分布的于越腹地相去甚远的广东西部地区也有着一定数量的发现，而这之间的地带迄今尚无所发现。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于越地区发现的镇不仅种类繁多，包含有玉质、铜质和原始瓷质及陶质的各种形态，而且其年代普遍较早，最早的目前发现为春秋晚期，最晚的也在战国早中期，而尤以战国早期和早中期之时发现甚为丰富。而在此之后，该地再也不见镇的踪迹，似乎是在突然之间便消失殆尽。而与此同时，在相距数千里的广东西部的四会高地园又发现了该类器物，并且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而且，该处发现的铜镇，较早时其形状与于越地区的同类器基本一致，而在稍晚的时候即在战国晚期以后，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明显变扁矮，最后到秦汉之际时又变成了方形。再从出土的情况来分析，于越地区出土的该类器物在有明确出土情况的墓中多处均为4件，而在广东西部地区早期时为1件或两件，到了晚期，才有了比较完整的组合。根据以上现象分析，我们认为，镇的原产地当在浙江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从其出土的地域来看，这类器物并没有普遍分布于当时的越国境内，应当是于越族中的一支的特色器物，越国强大的时候影响到了苏南地区和湖北的个别地区。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越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世学者多认为此后于越的一些支族沿海南迁，分别在灵江、瓯江、闽江一带建立东越、瓯越、闽越等小国。法国人鄂卢梭则认为：“纪元前333年，（楚）灭了越国，拓地至于浙江（水名）。越人乃因此役以后，始往中国南海沿岸迁徙。”“这些南迁的越人，先在浙江南部同福建建立东越。”“其余的远徙到广东同广西的北部，他就是建立了南越的那些部落。”“最远的到了广西南端，广东西南境，东京同安南北部，这就是越种的西瓯或骆民。”<sup>[41]</sup>虽然蒙氏对此说大加批判，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于越人的一支因越楚战争而往西南迁至广东西部也是极有可能的。刘波在《岭南地区东周青铜器分群研究》一文中将两广地区东周时期青铜器分为长方釜斧钺群和椭圆釜斧钺群两个大群，并认为他们“代表着东周时期分布在岭南地区的两支不同的文化。”前者又可以分为A型短剑亚群、长剑亚群和混合型亚群三种，认为其中的长剑亚群若干青铜器原产地在吴越地区，陶器也与吴越地区所出的部分陶器关系密切，最终得出“该文化的源头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的结论。<sup>[40]</sup>而广东西部也正是长剑亚群和混合亚群的分布区域。除铜镇外，四会高地园M1:17釉陶缶与浙江江山大溪滩乡大夫第M:8原始瓷罐<sup>[42]</sup>、上虞凤凰山M144:1的瓷甗<sup>[43]</sup>基本一致，高地园M1:20硬陶钵与绍兴凤凰山M2:24小罐<sup>[44]</sup>非常接近，该墓出土的碗和盃也常见于越国地区。广宁铜鼓岗M14出有长铜剑，为典型的吴越式铜剑，该墓出土的II式铜短剑除长度

略短外,形制则与吴越式铜剑一致。松山北岭的年代明显较其他组为晚,因此在器物形制与组合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该墓的方形铜镇和长铜剑应当也是受到了于越文化的影响的。

这样,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镇是春秋战国时期越人的特色器物。其原产地当在浙江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是生活在越国腹地的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晚期创造使用,并大量流行于战国早中期的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更进一步的说,它们极有可能与越国王族关系比较密切。在越国强盛时期,曾经影响到了周边地区。越国败于楚后,使用镇的人群将其带到了广东西部地区,这时期及稍晚时期在广东西部发现的镇应当是直接从浙江带过来,而不是当地的产品,因此形态上与后者基本一致,而且最早出有铜镇的高地园 M1 与越国地区出土器物的相似程度也是最高的。但随着这些人群与当地越人的融合,这种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持。因而,该地发现的镇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规律,墓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到了秦汉之时,其形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表明他们已经是受到了用镇习俗的影响而于本地铸造的产物了。此后,随着这些人群完全融入到了当地越人中去,这类器物也最终消失殆尽。

---

## 参考文献

- <sup>[1]</sup> 何纪生遗作. 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J). 考古, 1985, (4): 360-364;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A). 考古学集刊(C)第一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11-118.
- <sup>[2]</sup> 淮阴市博物馆. 淮阴高庄战国墓(J). 考古学报, 1988, (2): 189-232.
- <sup>[3]</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彭东、东安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C), 科学出版社, 1993. 185-19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J). 文物, 1985, (8): 66. 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浙江绍兴市发现的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J). 考古, 1996. (4): 29-35.
- <sup>[4]</sup> 沈作霖. 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J). 考古, 1979, (5): 479、480、458. 余杭县文管会, 沈德祥. 浙江余杭宗贤战国墓(J). 东南文化, 1989, (6): 121-125.
- <sup>[5]</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印山越王陵(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曾侯乙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44、247.
- <sup>[6]</sup> 孙华. 半球形器用途考略(J). 南方文物, 1995, (1): 107、110.
- <sup>[7]</sup> 周燕儿. 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J). 江汉考古, 1998, (1): 73-76.
- <sup>[8]</sup>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4, (1) 1: 69.
- <sup>[9]</sup> 同[7].
- <sup>[10]</sup>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曾侯乙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61-63.
- <sup>[11]</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印山越王陵(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sup>[12]</sup> 黄展岳.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J). 考古学报, 1986, (4): 427.
- <sup>[13]</sup> 李龙章. 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J). 考古学报, 1995, (3): 278. 以下简称李文.
- <sup>[14]</sup> 何纪生遗作. 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J). 考古, 1985, (4): 360-364.
- <sup>[15]</sup> 广东省博物馆, 徐恒彬. 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J). 文物, 1973, (9): 18-22.

- 
- [16] 朱凤翰.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1105.
- [1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广州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117.
- [18]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A). 考古学集刊(C)第一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11-118.
- [19] 同[2].
- [20] 朱凤翰. 古代中国青铜器(A).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1105.
- [21] 王厚宇. 试论淮阴高庄战国墓的时代、国别、族属(J). 考古, 1991, (8): 737-743.
- [22]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曾侯乙墓(A).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44、247.
- [23] 同[7].
- [24] 皮道坚. 楚艺术史(A),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79.
-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印山越王陵(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2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J). 文物, 1985, (8): 66.
- [27] 杨楠. 江南土墩遗存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50、56后图表.
- [28] 陈元甫. 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试论(A).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93.
- [29] 刘建国. 试论罍于的类型和分期(J). 文物研究总第5辑. 安徽: 黄山书社, 1989. 138.
- [30] 余杭县文管会, 沈德祥. 浙江余杭宗贤战国墓(J). 东南文化, 1989, (6): 121-125.
- [31] 周燕儿等. 浙江绍兴县出土一批原始青瓷器(J). 江西文物, 1990, (1): 56、57. 周燕儿. 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J). 江汉考古, 1998, (1): 73~76.
- [3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彭东、东安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185-199.
- [33] 何光岳. 百越源流史(A).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 21.
- [34] 张一民. 西瓯骆越考(A). 百越民族史论丛(C).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 135.
- [35] 蒋廷瑜. 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A). 百越民族史论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21;
- [36] 陆明天. 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其族称(A). 百越民族史论丛(C).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 154.
- [37] 韩振华. 秦汉西瓯骆越(瓯骆)之研究(A). 百越民族史论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164.
- [38] 同[21].
- [39]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 苏州虎丘东周墓(J). 文物, 1981, (1) 1: 51~54.
- [40] 转引自蒙文通. 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A).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9.
- [41] 刘波. 岭南地区东周青铜器分群研究(A). 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0: 296-323.

---

<sup>[42]</sup> 江山县文管会, 毛兆廷. 浙江江山县发现战国墓. 文物, 1985, (6): 22-24.

<sup>[43]</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206-257.

<sup>[44]</sup> 绍兴县文管会. 绍兴凤凰山木椁墓(J). 考古, 1976, (6): 393.

## **The *Zhen*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southeast China**

Zheng Xiaol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130012)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a kind of characterized implements named *Zhen*, which is distributed mainly over the area where the ancient *Yue* nationality resided, we revealed the law of its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n this basis and with the related record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infer that in the medium and later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a branch of the *Yue* nationality had moved from the northeast of Zhejiang to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Keywords:** *Zhen* ; Southeast China ;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Ancient *Yue* nationality migrate

收稿日期: 2003-10-27

作者简介: 郑小炉(1977-), 男(汉族), 江西玉山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生.